

列宁主义影响下的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初探

曹 芸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1100)

摘 要: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理论与实践联系,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毛泽东直接吸收和借鉴了列宁的许多思想与历史经验。在列宁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的民族特点和现实国情,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前提;以群众本位为指导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力量;重视群众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利益需求的保障和满足,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驱动力量;利用学校、报刊等多种渠道并通过自我教育、学术探索等多种方式为马克思主义走进大众建构了多样化途径。

关键词:毛泽东;列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A82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5)06-0015-05

毛泽东和列宁,一个带领积弱积贫的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开启了中国梦的伟大篇章,一个亲手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理论与实践关联。由于近代中俄两国国情相似,毛泽东最早是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的,而列宁也格外关心东方落后民族尤其是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成熟起到了昭彰的指引与向导作用。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主体、动力、途径等问题上,毛泽东直接受到了列宁相关思想的影响与教导。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条件:认清民情

19世纪末中国在被迫卷入现代化的世界图景后,传统文化已无力跟上历史的步伐,耸立几千载的孔家圣殿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颓然崩塌,中国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思想主体,重建文化大厦。俄国革命的炮声虽然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作为一种无论语言表达还是思想内容都具有异质性的外来理论,如果不能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相融合,依然不能引导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从列宁的理论与实践中学会了这一历史真谛。列宁之所以能够在贫穷落后的俄国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就在于他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成功地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民众心中

扎下了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及实践对毛泽东的影响举足轻重,“毛泽东说过,他先是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1]27}在陈独秀等人面对各种纷至沓来的思想和“主义”表现出全盘西化的极端倾向时,毛泽东已经较早地树立了中西结合的正确文化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异军突起之后,毛泽东已经自觉地开始了使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他从列宁的实践经验中得出结论,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具有指导世界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力量,是因为它与各个国家的革命实践具体地历史地联系在一起。同样地,只有结合中国实际问题并运用符合民族特点的传播形式,马克思主义才能由理论转变为现实^{[2]534}。

列宁曾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3]359}中国正是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东方国家。列宁虽然没有为中国革命指出具体道路,但在方法论层面上给予了指导,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运用“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

收稿日期:2015-04-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KS007);河海大学中央高校业务费项目(2015B10714,2013B02314)

作者简介:曹芸(1980—),女,湖北钟祥人,讲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用”^{[4]256}。毛泽东深刻领会了这一方法论,他虽然高度评价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并且得出“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但同时强调,“走俄国人的路”并不是照搬俄国模式,而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5]1471}。在列宁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在中国前途晦暗不明、革命面临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将中国社会定义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就为明确中国革命的对象以及领导和依靠力量奠定了基础,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途。

认清中国国情与民情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必须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列宁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国情民情的结合,国内战争结束后,他根据民情国情等实际情况的变化对党的工作重心作出重大的政策调整,宣布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实行新经济政策,恢复了国内商品流转,实行了租让制、租借制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国内经济得以复苏。毛泽东说:“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6]803}针对党内某些干部因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倒背如流而以马克思主义权威自居的现象,毛泽东批评说:“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7]187}他指出,只会背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词句而对中国现实问题视若无睹,不是真正的理论权威,真正的理论家必须能够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和方法出发,对中国历史上与现实中的实际问题予以合理解释和正确解决^{[6]814}。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现实的激荡和碰撞中曾遭遇教条主义的侵扰,教条主义引经据典而不顾客观的实际情况致使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挫折,为此毛泽东专门写了《调查工作》《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肃清了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使广大党员群众树立了对待理论的正确态度,领会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精髓。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力量:群众本位

化,有教化、感化之意,大众化的对象是人民大众,这里涉及的前提问题是如何对待群众。列宁的群众观历来容易引起争议。日本学者新岛淳良指出,群众自身而不是优秀知识分子的成长问题是毛泽东思想时代与列宁主义时代的主要区别,从领导

者角度来看,前者提出的重要理论问题就是“尊重群众,或者群众才是主人,是革命的主体的观点。”^[8]这一评论看似言辞温和,实则潜藏着对列宁群众观的犀利批评,他甚至认为对待群众的不同态度导致了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在诸多方面的分歧。马尔库塞也对列宁的灌输思想提出了质疑,因为它“预示了后来事实上无产阶级由革命过程的主体变成了革命过程的客体”^[9]。事实上,列宁不但十分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十分重视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主体地位,他不仅身先士卒,在百忙中亲自为工人群众讲课,还根据俄国工人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现实情况,为他们挑选和编辑教材。毛泽东虽然一贯坚持群众本位思想并在实践中总结了独具特色的群众路线,但其群众观很大程度上源于列宁的群众态度和群众方法,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窥见一斑:

其一,深入研究群众,了解群众的多质状况、具体构成及不同特点。列宁曾经通俗地举例,工程师、农艺师、林学家等等都将循着自己与众不同的途径接受共产主义^{[3]193}。这种观点显然辐射到了毛泽东,他也用同样通俗的话解释大众化,“既然射箭须瞄准靶心,弹琴要考虑听众的接受水平,那么写文章做演说怎么能不针对读者和听众呢?”^{[6]836}群众虽然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但这一整体却由多种异质的成分构成,了解群众多质性特点,是为了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对象实际情况的大众化方式。对于理论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等,可以通过直接学习经典著作、进行理论探讨、开展思想交流等形式提高他们的理论修养;对于广大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农群众而言,各种民间艺术形式、通俗而富有感染力的演讲等无疑更能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

其二,学习群众语言,吸收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话语转换。作为一种外来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隐含着与其他民族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同时,它虽然以实现人民大众的最终解放为旨归,但使用的仍然是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列宁在向俄国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时,经常使用群众熟悉的典故、俚语,他同时指出,东方各民族共产党面临的一个共同任务就是要“把指导较先进国家的共产党人的真正的共产主义学说译成各民族的文字”^{[4]233}。语言是思想的言说者,单纯的文字翻译并不难,难的是在翻译过程中保持语言与思想的同步。毛泽东从列宁的实践中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倡导从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中吸收营养,批评口头上喊着大众化而实际上对群众话语一窍不通的人,“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6]841}毛泽东还善于从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用符合中国人思维特点的传统话语诠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例如他将辩证法中的矛盾概念概括为“一分为二”,将主观符合客观、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诠释为“实事求是”这一成语,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等等。英国学者威尔逊指出,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贡献就是用普通民众和教授都能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同时使之地方化,以便中国人民能和欧洲人民懂得一样多”^[10]。

其三,关心爱护群众,实现与群众的情感交融。情感对于人的认识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列宁极其重视这一因素,认为它是人们追求真理的动力源泉^{[11]117}。他长期亲自处理群众事务,坚持及时回复群众来信,正是由于关心牵挂群众疾苦,重视了解群众呼声,列宁的演讲和文章才引起人们强烈的情感共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目的、参与者都是人,现实的人的丰富情感决定了这不仅是一种认识活动,更是一种情感活动。毛泽东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简单来说,大众化就是我们自己和工农兵大众在思想和情感上打成一片^{[6]850}。他还说,文艺工作要解决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1905年就已郑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6]854}在这方面毛泽东自己就是表率,他去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时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同农民一起劳动,及时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他们对苏维埃政府、干部的态度。在毛泽东心目中,“群众”是一个极有分量的神圣词汇,他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与群众一同经历喜怒哀乐,品味酸甜苦辣。因此有学者这样评价,“群众情结”深深渗透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之中,是他生命中最质朴的色彩,体现了他深沉的“赤子情怀”^[12]。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动力机制:满足利益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虽然关注的是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但只有从群众的切身利益中找到理论的契合点,才能走向并走进大众。列宁认为,利益对于社会成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四周年后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走向社会主义不能仅凭十月革命所激发的革命热情,而是要“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3]247}。这里所说的“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也就是指要关心群众的个人需要,满足群众的正当利益。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利益思想,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5]1318}他还结合中国具体的历史语境对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利益原则进行了发展与创新。

一方面,注重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结合。长远利益关系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实现具体利益的最终保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多次出现过工人运动被眼前利益、局部利益所诱惑而放弃长远利益的深刻教训,列宁就曾经批评俄国经济派醉心于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忽视长远的政治任务,把工人运动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从而腐蚀了工人群众的政治斗争意识。“这就完全等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立自主权,从而也就否认它的生存权;这在实践上就是想把刚刚开始的工作变成自由派的尾巴。”^{[4]63}只有将长远的政治利益作为革命纲领予以重视,马克思主义才能获得群众持久而深刻的理解和支持。在民主革命时期,群众的长远利益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获得民族的独立解放和民主自由。毛泽东依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斗争任务的思想,把握住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出了最符合群众利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当然,长远利益的实现必须结合当前利益的满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与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现实利益迫切相关的就是土地问题,通过实行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将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等许多土地改革措施,党扫除了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广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众化。

另一方面,注重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结合。物质利益关系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所有需要的核心。马克思对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从不遮遮掩掩,甚至直接将它视为一切社会矛盾运动和发展的最终动因。列宁也坦承,社会主义简单来说就是要“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13]546},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这是整个工农政权、苏维埃俄国生死存亡的问题。”^{[14]241}因此他在国内战争一结束就克服重重阻力推行新经济政策,使民生得以在较短时间内有所改善。列宁的思想与实践经验对毛泽东有较大影响,在革命斗争的艰难岁月里,解决群众物质利益面临极大困难,毛泽东仍然时时处处惦记着群众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 and 婚丧嫁娶等一切实际生活问题,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5]467}。正因为保护和满足群众的物质利益,马克思主义才获得了群众的真诚拥护,革命的星星之火才得以燎原。当然,“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不是唯一的原则”,“精神鼓励”等也是“另外的原则”^{[16]133},因此他非常关心群众的精神生活,强调文化、科学、教育、艺术等工作要为广大服务。毛泽东否认所谓超阶级

的纯艺术,要求党的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工农群众和实际斗争,围绕党和人民的事业,创作出具有亲和力的文艺作品,这对于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的结合。他认识到,一切上层建筑的变革归根结底依赖于经济基础的改变,因此,保障人们的经济权利、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是不能忽视的工作。例如他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明确指出,当前党的重要任务既包括集中经济力量保证战争供给,也包括尽可能地提高群众生活水平^{[7]130},如果群众生活和福利不能逐步提高,革命就没有必要。当然,由于政治解放是人的解放的重要一环,在满足群众经济利益的同时,毛泽东也注重发展和保障人们的政治权利。20世纪30年代在主持苏维埃临时政府工作期间,他曾领导制订并相继颁布了《宪法大纲》等许多法律文件。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的法律水平甚至已经超过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西方国家^[17],从而保障了人们在各方面都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也保障了人们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

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导途径:多样统一

理论的广泛传播必须借助有效的传播手段。列宁在向俄国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传播方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总结了诸多宝贵的经验和理论。

以学校、社团、工会等组织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阵地。学校历来是人类知识得以实现代际传承的集中场所,也是青年学生发展身心、提升素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塑造共产主义价值观的主要阵地。列宁强调教育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谓教育‘不问政治’,教育‘不讲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说法”^{[3]170},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并通过学校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18]249}列宁也非常重视工人阶级中各种社团组织特别是工会的作用,指出“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工会要善于适应群众”,同时“又决不当姑息群众的偏见和落后”、“善于在各种具体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对待群众,在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把群众提高一步”^{[3]305}。受这些思想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萌发了向工人传授知识的想法,并创办了湖南第一所工人夜校,在向工人灌输历史知识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同时,也了解了当时工人的生活工作和

思想状况,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联系。湖南自修大学会成立后,毛泽东亲自为其撰写创立宣言。同时他还在广东等地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向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红军到达陕北后,各个根据地纷纷建立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列宁小学及各种工农夜校和专科学校,使许多儿童和成人进入学校读书识字,为党和苏维埃培养了许多干部。马克思主义通过学校、社团、工会等多种组织得以广泛传播,形成了异质于国统区的文化氛围,展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力量,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

以报刊媒体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工具。列宁曾创办、领导和编辑了数十种革命报刊和杂志,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党报理论,如党报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必须保持其思想内容的先进性从而引导群众的政治方向,必须根据党的工作重心及时调整宣传重点等等。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与实践。早在建党前,毛泽东等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就创办多种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并任主编,笔耕不倦地引领了许多年轻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抗战时期,毛泽东专门为《中国工人》写了发刊词,勉励它以通俗的语言解释深奥的理论。他还注重利用各种新兴媒体传播马克思主义,1940年建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后又成立英文广播部,及时向海内外播报和传达党的理论政策,有效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

以自我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手段。列宁是“灌输论”思想的倡导者,但他并不主张以灌输取代自我教育,相反,他强调党员和群众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学习等方法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不仅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要努力改正错误,只有如此,才能登上胜利的山峰^{[19]645}。毛泽东也非常重视自我教育,他在延安时期发起的整风运动就是结合中国实际对列宁自我教育思想的创造性运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20]275}1938年9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第二年春特设干部教育部,领导和组织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1941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他还亲自开列理论学习的文件,包括《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等。学习和整风运动是一场广泛的思想洗礼,在肃清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同时,也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此后,马克思主义以

空前的速度、广度和深度走进人民心中,进而转换为指导他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理论武器^[21]。

以学术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积淀力量。列宁终生孜孜不倦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留下了一批流传甚广的学术成果和大量读书笔记。在他的指示下,先后成立了十月革命史和党史资料收集研究委员会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并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毛泽东从列宁的实践经验中认识到,只有依靠学术研究才能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水平和层次,因此“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2]728}。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早在1918年,毛泽东就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创办了文化书社,发起俄罗斯研究会,致力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经验。抗战时期虽然经费紧张、物资匮乏,但中共中央依然专门成立了延安解放出版社,1939年又设立中央发行部,其下属的新华书店发行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与此同时,毛泽东自己也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写了《矛盾论》《实践论》等许多具有理论深度的著作,为指导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当然,由于受到特定年代下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过于追求群众的“喜闻乐见”从而不可避免地迁就群众的落后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简单化理解,但总体上看,他还是较好地平衡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学术化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由于毛泽东一开始领导中国革命就受到列宁主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故而没有倒向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因此,其思想事实上可以说是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后者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22]。据统计,毛泽东仅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援引列宁的论述分别就有5段和12段之多,可见列宁的相关思想及实践经验对毛泽东产生了直接的指导作用。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桥梁和中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甚至整个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毛泽东对列宁思想的认识和运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作风,他不是机械照搬列宁的大众化经验,而是结合中国具体民情找到了适合中国的大众化路径,并在适应中实现了进一步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当前仍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毛泽东对列宁大众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中所积累的思想财富和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和探索。

参考文献:

- [1] 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 新岛淳良.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J].徐黎,译.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5):104-108.
- [9] 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M].张翼星,万俊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7.
- [10] 威尔逊.毛泽东[M].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497.
- [11] 列宁.列宁全集:第2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12] 安建设.毛泽东的“群众情结”[J].党的文献,2010(4):109-110.
- [13] 列宁.列宁选集:第三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4] 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15]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6]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7] 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史稿: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99.
- [18] 列宁.列宁全集:第4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19] 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0]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1] 艾四林,刘国强.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六个基石[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3):13-19.
- [22] 胡运锋.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的理论关联[J].求实,2011(6):17-20.